

THE DESTINIES OF FAMOUS IDEOLOGISTS IN THE WOR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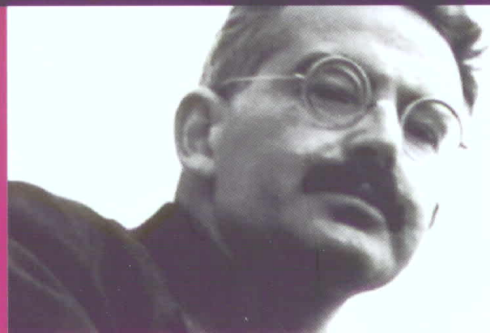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命运丛书

总主编 戴安康
副总主编 陈鹤鸣



世界著名 思想家的命运

主编：陈鹤鸣 谭元亨



广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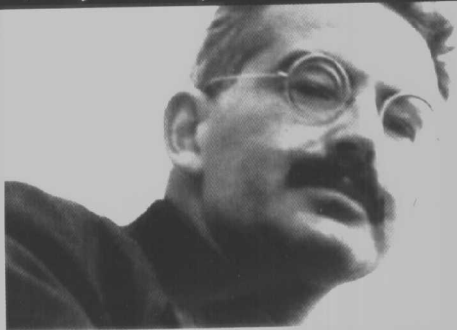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命运丛书

总主编 戴安康
副总主编 陈鹤鸣



世界著名 思想家的命运

主编：陈鹤鸣 谭元亨



广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马丕环
责任校对 李带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著名思想家的命运/谭元亨、陈鹤鸣主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4(2003.6重印)

(世界名人命运丛书/戴安康主编)

ISBN 7-219-03881-X

I.世... II.①谭...②陈... III.思想家—列传—世界 IV.K8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4365号

世界著名思想家的命运

谭元亨 陈鹤鸣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邮政编码: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787×1092 1/16开本

28印张 668千字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3881-X/K·771

定价:36.00元

总 论

谭元亨 陈鹤鸣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历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这思想的历程,是以一位位思想家的名字为标志,为里程碑的,于是,作为思想家的命运,也就同思想的进程、同一部人类的历史牢牢地焊接在了一起。

那么,编写这么一部著名思想家命运的书籍,着眼点也就不仅仅在“著名”之上,而应当给读者更广博的知识、更深刻的启迪,也就是说,同样应该让他们思想上有所得,了解人类思想的历史进程,了解今日思想的发展趋向,这也同样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正是思想提供了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与运动规律。不然,何以科林伍德会断言道:“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的确,思维方式的每一次进步或变化,都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来进行修正的。也正是这种修正,使处于不同现实的思想家们承受了不同的命运的播弄,或辉煌,或黯淡;或成功,或败绩;或众望所归,或默默无闻于当时;或为神,或成鬼……甚至在同一时代、同一境遇下,由于种种原因,亦可以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当然,历史最后总是要显示它的公正的,在现世岑寂无声者,甚至惨遭不测者,到后世却以其思想而成洪钟大吕;而显赫一时者,后世却无人问津……思想是无援的,却也是无敌的,它超越时空,超越一切世俗的褒贬,而走向不朽,走向永恒,从而永远不可战胜——这,又是思想的命运。

因此,我们在写到作为思想家个人的命运之际,亦注重于思想本身的命运。

于是,在选择思想家的同时,我们也选择了思想——思想发展的脉络、轨迹,它应有的走向,也就是命运。人类的思维,本身就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概括的发展历程。在每个历史阶段中,人类的思维都有着不同以往的发展、变化以及某种跳跃——或称革命性的飞跃。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从而使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各放异彩。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这一部“思想家的命运”的书,我们决定不同于《作家命运》一书的编排,不分中、外,或按亚、欧、非、拉等区域而划开,只按编年史的方式把中外思想家交错在一起。

这一来,我们便能有所比较,有所鉴别:为什么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蜂起之际,在古希腊也同样有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那时,世界思想的发展,在相对的意义,上是同步的,各

位大思想家的观点,也有很多的接近……这种同步,本来也应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发生的,那时,中国也出了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如李贽、黄宗羲、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等等。李贽以“异端”自居,提出“道为一身”的天赋平等论,要求“各从所好,各骋所长”的个性解放,黄宗羲更对封建专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倡言“计口授田,工商皆本”、奖励“绝学”(即科学)……本来,明代中叶之前,我国科学技术仍居世界先进地位。如果这批启蒙思想家的疾呼能得到回应,中国当时也同样可以出现一个“文艺复兴”,告别封建社会,与世界同步。然而,由于战乱,由于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反而把中原业已腐朽的文明视为至宝,从而使中国的封建社会来了个两三百年的回光返照,中国一下子便远远落在了世界的发展步伐之后,才有了此后的屈辱历史。而当时启蒙思想家的悲惨命运,就更加教人不忍卒读……及至几百年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的悲剧,也就更让人扼腕了——从先后两个思想家群落的归宿,我们难道不能从中领悟到更多的、非字面上的东西么?

当我们今天还在讴歌康熙大帝的文治武功之际,可曾放眼于世界,想想自身的可悲——如果不从思想史的角度上,如果不深刻认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论断,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么?

有时候,不,相当多的时候,从一位思想家的命运上,我们可以读到比当时的政治史、经济史、风俗史等上面更多的内容。

思想家的命运,赋予我们的思考是永难止息的。

没有横向的比较,也难有纵向思考所具备的深度——正是在这上面,我们才可能认识到思想史发展的重要性。

思维的每一个变化、发展与飞跃的成功与否,对于当时的历史时代与社会所起的作用与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它完全是创造的源泉,它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可以毫不迟疑地称:人类所创造的每一样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实际上都是属于思维的结晶。“文艺复兴”在西方带来的科学文明的发展,众所皆知;而启蒙思想的夭折,给中国带来的倒退与落后,更是有目共睹。这样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么?

今日澎湃于中国大地上的思想解放的大潮,我们有理由期待它的一往无前,并有理由企盼作为代表这个时代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应运而生。中国不可以再倒退了,不可以再扼制思想的发展了。如何改变我们民族落后的思维模式,打破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和信守常规的落后观念,关系到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成败。新的启蒙者,应当培养、形成我们全民族勇于变革、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科学品质,让这个 5000 年的古老民族,在今日的起点站得更高,才会拥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这,应是编写这部书的初衷,同时,也是这部书不同于《作家命运》一书的编排的用意所在。立意之高低,是一部书的基本质量的表现,我们将尽自己的能力,使此书有更高的格调,能作为“保留节目”而赢得更多的读者。

此外,此书一个显著的特色,是它的纪实性。前边,我们讲思维,讲比较,应该说是阐述这部书的“魂”,没有“魂”的书,只是徒具一个躯壳。那么,从纪实性而言,纪实则是这部书的血肉,有血有肉,才有生命的鲜活,才生动而真实,这同样是一部书所不可缺少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写到思想家命运的大起大落之际,作者们的笔端无不激荡起热情、浩叹,乃至发出呐喊。这是动人心魄的,史识与诗情,正是纪实作品中最富于生命力的表现。没有史识,图解政治或概念,也就看不到人物与事件深厚的底蕴,显得肤浅与苍白;没有诗情,

平铺直叙，古板加深奥，是无法吸引读者的，更谈不上让读者产生共鸣了。激情，是纪实作品的酵母，虽然我们并不排斥冷静的描述，但众所周知，愈是冷静的笔调后面，每每愈有巨大的情感之暗涌，同样是要震撼读者心灵的。

尤其是思想家的命运，他们不像大多数军事家、政治家一样，一生可能屡遭挫折，但最后总是可以亲自感受、亲眼目睹到所取得的成功。思想家一生可能永远只有失败，只有不为人所理解、所承认、所接受的寂寞，乃至于悲惨的结局。他们每每太超前了——不超前，他们就不可能成为思想家，所以不可能企望其在世时的辉煌。

因此，他们的辉煌每每只能在身后，在他们的思想上——凭借不朽的思想去征服世界。这么一来，我们不仅得写他们在生的命运，更得写到他们身后思想的命运了，这也是他们命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且是更重要的一部分。

二

笔下这 60 位中外著名思想家，有着各自迥异，却又多姿多彩、千变万化，难以一一道尽的命运。

而他们不同的命运，给予我们的读者、我们的今天，又将是怎样的启迪——换句话说，他们又给予了我们怎样悠长的思考？

首先，应是他们共同之处——对整个个人类命运的历史关注，把个人的命运融入于整个人类的命运之中。

没有这样的关注，是不可能引发其深远、深刻的思考的，也就不可能迸发出璀璨的、伟大的思想之光。他们当中，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均是忧国伤时、慷慨悲歌之士，无时不在为民族、为国家、为全人类而煎心焦虑，甚至不惜为人类的未来设计出理想的蓝图——虽然这些蓝图今日看起来似乎也不怎么样。例如，老子说的“小国寡民”，柏拉图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乌托邦”；尤其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设计出的共产主义远景，也都是那么让人动容，他们无不从人类的痛苦中超越出来，苦苦寻找人类有可能的未来，使一个非理性的社会，尽可能地合理一些、公平一些——这就便要说到洛克、说到霍布斯了，也包括他们的分权与制衡的学说，在今日世界业已产生的重大影响。

正因为这样，他们的思想，才会超越时间与空间，与整个人类的命运——历史的、现实的与未来的紧紧地焊接在一起，从而让历史成为思想，让思想来证实历史，让思想来开拓未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史才是惟一真实的历史，不可以阉割与篡改或伪造的。这也是思想的伟大之处，思想家伟大之处。

正是对人类命运的认同，他们对个人的命运才有着出色的表现，有着各自鲜明的、独特的取舍。

勇敢地面对命运的挑战，高高挑起应战书，纵然殒身也在所不惜——这个，在布鲁诺，是这么做了。他是这么说的：“什么也不怕，为了热爱神圣事物，而轻视其他快乐，对自己的生命毫不挂虑。”他也是这么做的，受尽苦刑，面对火刑呼啸的火声，仍大声宣布：“火并不能征服我，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道我的价值。”伟大的苏格拉底，拒绝买通狱卒而逃命，更不愿向审判团求情，声称“这是我死的时候了，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以他的死，来殉他的哲学思想，来感召与启迪人们去追求真理，维护人的尊严。在中国，墨子则是最早宣布不相信命运的，在面临战祸与横逆之际，他与巨子们前仆后继，为自己的学说得到实行而贡献出一切。至

于范缜,更是决不“卖论”——出卖自己的思想,去“取官”——换一个一官半职;柳宗元几度被贬,亦不改初衷;李贽,更是以死抗争,决不屈服;谭嗣同更称“各国变法无不从鲜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在临刑前写下了千古绝唱:“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类似的“殉道者”,我们还可以提到很多的人。像托马斯·莫尔、康帕内拉、黄宗羲、顾炎武、梅叶、马克思、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可以说,他们面对人生、面对命运所持的积极态度,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构成了思想家这么一个“历史群落”的主旋律,一个高亢、悲壮雄浑的主旋律,闻之者无不热血沸腾,与他们一般不惜殉身以求得真理光芒四射!他们,无疑是思想的楷模,也是人格的楷模,是令千古所景仰的。

不过,思想,有时是在烈火中升腾、激流中碰溅、暴风骤雨中飞扬的——这就是前边所道,而有时,却也需要清江澄浪、平沙落雁,需要空旷与辽远,让思想得到沉淀与洗炼,从而更加博大精深。因此,面对命运,有的思想家又取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态度——即貌似消极,但实质进取,表面看无为,内里却无不为——一说,读者马上便会联想到被视为东方哲学最伟大的代表老子了!他连治国,也称之“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西出函关,如不挽留他静静写下 5000 言的《道德经》,他的思想说不定也就没了在这东方 2000 多年的影响了;庄子的态度也大同小异,否则,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为何能成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学的“开山祖”——他们似乎是“消极”地保存了自己,却积极地弘扬了自己光辉的思想,凭此,我们亦不可能因他们在生的“消极”而去苛求于他们,反而应感激这种“消极”。在西方,类似的人物也不少,如大思想家笛卡尔,则称“我只希望宁静和休息”,也许,这才有他“我思故我在”的名言,连洛克,也称自己“满足于小康命运”——但他的思想却是宏博而伟大的;至于尼采,更是在孤独中去寻找自我,他背负的是整整一代人的痛苦,以至称“我的时代尚未到来,有些人要死后才出生”。他对自己说:“你今天是孤独的怪人,你离群索居;但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民族,从你们这些精选的人中将产生出一位超人。”他也就成为了这么一位超人。这种“消极”,大概可以算得上“老谋深算”了——无疑,这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种方式,而这种方式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悟到的,或者做到的。

当然,也有的思想家,无从谈及对命运的态度,只是一个不测,便香销玉殒,失去了生的机会。如韩非,本来可以雄心勃勃实施自己“法治”的主张的,可“出师未捷身先死”,竟被诬陷入狱而死;又如巴赫金,更是被历史“冷藏”了差不多半个世纪,当人们为他的思想而激奋不已时,他已去了冥冥不可知的深处……不过,这也应了柏拉图的一句话:“真正的哲学家,总是立志从事死亡,因此,他们在一切人中最不惊惶失措。”

的确,只要能把用自己全部心血锻造出来的思想留给后世,对于思想家而言,那便死而无憾了。生命,对于思想无非是一个寄寓的躯壳,思想永生,生命也就微不足道了。

那么,上述三种“命运”,纵然不足以概括思想家命运的全部类型,但可以说已经有了大部分了。

对思想家而言,在生时其天才与辉煌的思想得到承认,得到理解,并产生实践结果,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大都是不被承认,甚至要为此作出牺牲,献出生命;哪怕活着,思想仍遭冷漠、讽刺、贬抑乃至糟蹋,对他们来说,也同样是不幸的,因为,思想远远高于生命。当然,生前左冲右突,最后总算有所突破,也已算是万幸的。就算被承认了,被视为成功辉煌之作,却并没有多少人理解,那也是一种更深的悲哀——一种不可问津结果的悲哀,而

这种悲哀,则更是一切大思想家所无可避免的历史命运!

他们在生也许永远不可以有奢望……

三

但思想家的命运,绝不因为他们生命的终止便可以告了结——他们的思想,也仍要在后世面临命运的挑战,历史的拷问。

当然,思想家在世的命运,也反映了历史,反映了时代——思想,毕竟是从历史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不然,何以说,思想的历史才是最真实的历史呢——思想,是历史与现实提出的要求,没有这样的要求,便不可能产生思想。但是,这些要求,并不是一下子便可以为社会所接受,人们所接受的,当绝大多数人仍在昏睡当中,思想的呼唤并不可能立时得到回应;甚至,还会把你扼杀,重新回到“昏睡”之中,万劫不复。

历史上不少先行者每每只配用鲜血昭示于后人的命运,而不曾让其施展自己的才华与能力。天妒其才!人间的先觉悟者,只能以生命宣示其美丽。思想家,无疑就是先觉悟者,一个时代的先声,一段历史的先行。

那么,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则可以认为,一个时代对思想家容忍的程度,或者说,一个思想家在他那个时代的命运,则证明了这个时代觉悟的程度。思想家,也就是这个时代的良知,如果他被扼杀,也证明这个时代的良知尚未苏醒——正是在这点上,我们方可以体味到宽容、宽厚、宽宏大度,这在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是多么宝贵。否则,极权、专制、阴谋、黑暗、愚昧、野蛮、恐怖……便会扼尽思想的生机、人类的生机了。

所以说,思想家的沉浮,也代表了一个时代思想的命运,更是人类历史的命运。思想,总是在不断开拓自身,不断往前演进的。假如思想不前进了,被扼绝了,例如明末到清末这一段,那么,历史也就没有前进,只有倒退。中国的16世纪至18世纪,在世界思想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之际,却沉寂了,停滞了,一下子拉后了几百年——我们还要作更深入的比较。

这是思想与历史命运的关系。对于思想自身,也有个不断完善、不断超越的过程。最明显不过,在中国也许是知之甚多的,作为马克思的思想,它也是由前人的思想发展而成的。在哲学上,马克思把“头足倒立”的黑格尔思想倒了过来,让它双足立地,脑袋朝上,从而有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正是马克思,汲取了莫尔、圣西门、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使之科学化,真正立足于人类社会上,这才有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思想进程;至于他的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以及晚年的人类学手稿等等,无一不都是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而形成了他那无比壮丽与伟大的思想体系,直到今天,仍以其思想光芒照耀着我们。

这仅仅是一个人所周知的范例。在中国,古已有之的大同思想,到了近代,则有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而后,又有了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在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也都可以找到其思想脉络。到了现当代,思想空前活跃,像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等,也都可以找到其师承关系。思想,总是无所不在的,总是无法限制的,它无时不在开拓,在抗争,或潜伏以待崛起,或酝酿着新的飞跃。

思想,才是人类的无价之宝。

思想,给我们创造了多少伟大的灿烂的文明——如同百川汇聚,由小溪小河,到大江大湖,一直给我们展示出浩瀚无际的大海大洋来,翻涌起何等壮美的波涛!思想的源流,是永远

截不断的,也永远阻隔不了的!

思想家,便是这大海的缔造者,他不仅属于小溪小河——他所在的国度与时代,更属于大海大洋——人类的历史与未来,属于整个世界!

但是,对于一个思想家而言,历史的拷问,也同样是严峻的,如果他不曾同思想一道不断前进,相反,却有违初衷,或将已有的建树凝固不变,去阻碍别人的思想,那他就会走向反面,为历史所唾弃。戊戌变法的主帅康有为就是如此,在他发动变法之际,君主立宪,可以说是进步的,可变法失败,证明清王朝已无可挽救之际,他仍坚持君主立宪,最后竟沦为可悲的保皇党,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唱对台戏,他也就毁掉了自己。作为存在主义的大师海德格尔,却与纳粹合作,向法西斯政权宣誓效忠,一口阿谀奉迎之词,人格丧尽,弄脏了自己的手——正如一位学者指出,当代思想界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追究海德格尔,本身就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清算。

有的罪行,也许不可以归咎于个人,却逃不了思想干系,韩非的“法治”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正如一把双刃剑,他也在秦王朝“二世而亡”中展示出其思想的负面。严刑峻法,密如凝脂,摇手即触,把个国家变成了集中营、大监狱,完全否定道德而片面相信法律的力量,其结果,则让不堪压迫的农民起来,把实践他的思想的中国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推翻了。

这些反面的例子,也是命运的一个侧面或延伸,也是思想家命运与思想的命运的继续,从中,我们该感悟到很多,也获得新的思想——尤其是用来作为我们自己的参照——历史与现实的参照。

四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自“文艺复兴”以来,相应在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思想史上所能寻溯到的一切。

宋明理学的发生,正相应于“文艺复兴”之前中世纪最后也是最黑暗的岁月,所以,后人对它的批判,无一不痛心疾首。它在几百年间对广大老百姓的毒害是令人发指的。它带来了太多的灾难与苦痛。“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的这些疾呼,今听起来,仍痛彻心脾。可见当时的思想禁锢、人身荼毒,到了何等登峰造极的地步。

所以,与“文艺复兴”同步,中国出现了像李贽、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颜元、戴震等一批启蒙思想家。然而,他们却未如“文艺复兴”时代西方思想家那么有幸,得以在他们手上结束封建专制统治,开创一个现代的工业社会,并如当代思想家哈利·加芬克所认为的,把人类的思维从一个台阶推向又一个更高的台阶……在他们之后,中国思想的发展发生了断裂,至多,是发生了循环,却没有再向前推进了。而他们个人的不幸,是与整个时代的不幸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自然是更为深刻,也更为悲哀的大不幸了。

思想的禁锢,就这样绵延了好几个世纪,而人家已不知前进了多远了。

在明中、末叶,中国是有可能走向现代社会或由人称的资本主义萌芽状态向前发展到“工商皆本”的社会制度。其时,反对君主政治或反对封建专制的呼声已经四处发出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便是明证。然而,一场战乱,加上游牧民族入主,中国从此错失了一个历史的良机……直到今天,各种封建思想与观念,仍深深地浸透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之中,整个 20 世纪

都不可能摆脱,生活在当代的你我仍深受其害,这历史的教训,我们难道不应该记取么?

所以,我们写思想家的命运,写思想的命运,该领悟到什么,不是很清楚的么——不可以再禁锢思想了,再禁锢下去,将使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机窒息,我们将丧失掉我们可能的辉煌的未来!

正如本文前面已经说到的,思想,惟有思想,是人类创造的源泉。人类科学的发展,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所创造的任何物质与精神的产品,都是思想的结晶。人类惟有在社会实践充分开放自己的思维,才有可能创造出更高度的文明。否则,没有思想,不要思想,那么,人就不成其为人,人就要倒退到史前状态之中,与动物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什么迄今仍有人不能接受呢?

《国际歌》中,就有一句:

让思想冲破牢笼……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已指出:

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巧就是人的类的特性。

人们追求自由,追求自由思想,也就是追求自己本质特性的实现,这还能有什么可非议的呢?几千年来,虽然人类社会产生的异化力量始终在对人的本质加以扭曲、阉割,但是,人类为追求自由而谱写的可歌可泣的乐章,却从来没有停止过;思想家为追求思想自由的努力,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让我们把“思想自由”4个大字,写在我们行进的旗帜上,永远不收下!

无论有怎样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

我们只知道,思想是无可抗拒的,个人的不幸总会有思想的万幸作为补偿。历史,作为思想史,无论有怎样的曲折,也总是要向前进的!

谨以此,献给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目 录

总论	谭元亨 陈鹤鸣
01 东方思想最伟大的代表——老子	1
02 工匠出身的民间智者——墨子	9
03 西方文明的圣哲——苏格拉底	16
04 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德谟克利特	23
05 西方古代文明的圣哲——柏拉图	31
06 古希腊的思想巨星——亚里士多德	38
07 俯瞰万古混沌的智者——庄子	45
08 一统中国的帝王之师——韩非	52
09 高举如椽之笔的“汉代一人”——王充	60
10 决不“卖论取官”的无神论者——范缜	67
11 维护儒家“道统”的思想家——韩愈	74
12 清醒的流亡者——柳宗元	80
13 淡泊与艰辛中的睿者之光——李觏	87
14 向私有制挑战的勇士——托马斯·莫尔	94
15 划破漫漫黑夜的思想之星——李贽	102
16 火刑也无法征服的英雄——布鲁诺	109
17 挣脱中世纪铁索的伟人——培根	116
18 血与火锻造出的超人——康帕内拉	123
19 机械唯物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	132
20 为人类真理正名的人——笛卡儿	139
21 铮铮铁骨的思想家——黄宗羲	145
22 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独行者——顾炎武	151
23 站在中国古代思想终结点上的哲人——王夫之	159
24 “满足于小康命运”的大思想家——洛克	167
25 “哲学如其人”的哲学家——斯宾诺莎	173
26 不以一种事情而满足的大学问家——莱布尼茨	180

27	第一个背叛宗教的神甫——让·梅叶	187
28	创立“三权分立”学说的思想家——孟德斯鸠	194
29	十八世纪的拥有者——伏尔泰	200
30	近代西欧不可知论的创始人——休谟	208
31	把囚禁的情感解放出来的启蒙大师——卢梭	216
32	近代百科全书之父——狄德罗	224
33	德国哲学革命的先驱——康德	231
34	高举民主大旗的美国总统——杰弗逊	240
35	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圣西门	246
36	投身火热斗争的天才学者——费希特	253
37	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黑格尔	258
38	从慈善家到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	265
39	天才与荒谬集于一身的思想家——傅立叶	271
40	自命为“痛苦动物”的悲观主义大师——叔本华	277
41	实证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孔德	284
42	从神学转向人本学的天才——费尔巴哈	290
43	在科学山路上奋勇攀登的革命导师——马克思	296
44	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恩格斯	302
45	俄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车尔尼雪夫斯基	310
46	在孤独中寻找自我的哲人——尼采	319
47	架设近代中西思想桥梁的人——严复	327
48	斯芬克斯的揭谜者——弗洛伊德	334
49	中国“戊戌变法”的主帅——康有为	342
50	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	350
51	集哲学家、教育家与心理学家于一身的学者——杜威	359
52	“舍身求法”的近代英杰——谭嗣同	366
53	历史与心灵世界的探索者——克罗齐	372
54	大才如海的卓犖英杰——章太炎	378
55	用真诚铸造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罗素	385
56	“哲学家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393
57	死而复活的对话主义创立者——巴赫金	402
58	闯进哲学殿堂的伟大女性——苏珊·朗格	411
59	西方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萨特	419
60	与未来对话的大师——托夫勒	427

01 | 东方思想最伟大的代表

——老子

超越时空——历史与地域

有一句非常古老的中国格言，至今，仍在西方一个大国的国会中悬挂着，以儆示他们历届上任的首脑。

这段格言是：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谓我自然。

这段古文的意思是：最好的统治者，人们仅仅是知道他的存在；次一等的统治者，人们则觉得其亲近，并加以称颂；更次的统治者，人们则畏惧他；而最差的统治者，则人们轻蔑他、侮辱他。不值得信任，才会有不信任的事情发生。最好的统治者，总是很优哉游哉的，话说得很少，不擅长于发号施令，而事情办妥了，百姓也只会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乍一看，这段话有点“怪”，被老百姓一致赞许的统治者，反而算作“等而次之”，还不如那些百姓只知道他，无所谓好坏的统治者。而这么怪的话，偏偏又被一个最发达的国家政府奉为至理，似乎更不可理喻了。

但是，当我们得知这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一段故事的话，这一切又似乎很好理解了。在这个国家，前任领导人因阴谋事件的丑闻被迫下野——按理说，这位领导是很精明能干的，政绩卓著，但老百姓仍不能原谅他，并自然而然地想要寻找一个诚挚老实的代表人物。于是，一位农民出身的新总统上任了，“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这位新领导任满一届后，在一次总统好坏的评比中，他被选为“最无能的总统”，是历届最没用的。可他得知评比结果之后却说，我感到很欣慰，即便在我这样最没用的总统的领导下，我们的国家非但没有倒退，而且还在继续前进，这证明我们的国家与人民有多了不起。

姑且不论这里有没有粉饰的成分，只这么一说，却证明一条，领导者的作用已与整个国家无关了，老百姓仍在走自己的路，而不是用统治者的意志来左右老百姓。“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确是最高级的统治术。

本来，经济有它的“自然气候”，尤其是市场经济，如有“看不见的手”横加干预，竖加插足，只会把经济搞得一团糟；文化，更有其“自然气候”，都是宫廷诗，御用的文章，这国家就出不了真正的作家与艺术家了。当君主的意志取代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这个社会便了无生气了。

说到这里，中国人恐怕会大为感慨，几千年来，中国百姓，无不是把帝王视为整个国家，把

整个民族的命运，寄托在君主的贤明之上，老指望出几位明君与清官。结果呢？便麻木了整个人民的神经，束缚了人民的思维。如西方一位大文学家缪塞所指出的，一个国家，只靠一个大脑在思考，或者只有一个大脑在思考，代替了成千上万的大脑，这是何等可悲的专制极权呀！所以，哪怕出了一个人人称颂的明君，也绝非好事。

那么，在 2000 多年前，有谁那么早便觉悟到了这一条，并且说出如此深刻的格言呢？

这便是老子——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是东方思想最伟大的代表！

这是彻底地反专制主义的宣言，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当今民主政治的先声。可惜，几千年来，中国人并未很好地去认识它、实践它，只专注于“人君南面之术”。君主一般总希望百姓对他“亲而誉之”，这也许合乎儒家“德治”的主张。但主观上的好不一定有客观上的好，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体人民，只会造成更严酷的极权专制，哪怕他自以为代表人民。而君主一旦得不到“亲而誉”，便得树立起其赫赫威权，令百姓“畏之”，这大概合乎法家的“法治”了——当然，这与我们今天讲的法制并不是一回事，而严刑酷法，其后果更不堪设想，古今悲惨的范例可谓比比皆是。至于被百姓“侮之”的人君，恐怕就不必提了。所以老子这一段格言，比儒、法诸家均有过人之处，也彻底得多，一直到今天仍熠熠放射着光彩——当为千古楷模！

可惜，后人每每以他字面上的话去数落他，说他是什么“文明的反对者”、“主张复辟倒退”、“没落贵族的没落思想”等等，其实，是以词害意，不能理解这位作一千古绝唱之《道德经》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的老子。

当然，他在世亦不为人所理解，那么，身后亦何须企求后人的理解呢？

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思想家及其必然的命运！任何人、任何时代，都不可能以其已成的、惯性的思维去理解他——他是超越时空、超越历史与地域的，是属于全体人民，属于未来的！

扑朔迷离的身世

老子的身世，也可谓扑朔迷离——毕竟，他是中国最古老的思想家，离我们的年代是最久远的，要考证起来，非常困难。

司马迁在其伟大的纪传体通史《史记》中，尽管史料难考，却仍给他写了一个传记——没有他，一部中国史便不完整，甚至是缺了一大块。

虽说传记简单，但也记录了不少信史——他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即今河南省鹿邑县人，不过，别处亦有说他是陈国相人。但这并不矛盾，因为苦县与相同是一个地方，在陈国时为相，楚灭陈则改名为苦了。他姓李，名耳，字聃。这也有来历的，因为据说他生在李树底下，不知其父为何许人，故指树为姓。至于名“耳”，是因为他有一对出奇的大耳朵。至于后人称他为“老子”，是因为当时“老”是德高望重的意思，“子”则是古代对男人的美称，大凡有学问有声望的人，都能被称之“子”，如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等。

老子当过周朝的史官，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官职，专门管理祭祀与记事，但却未能一直当下去。才高八斗，自被小人妒之，于是乎西出函关，不知所终，幸被关令尹喜叫住，留下五千言《道德经》方放行，这才为人类的思想宝库留下这部万古辉映的瑰宝，让后人永远得到他的教诲——这就是他的命运，不为世所容，固是个人之不幸；却又为万世所景仰，却又是大幸，思想界的大幸！

司马迁在《老子列传》中记下这么一件千真万确的故事：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

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令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

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见老子，其犹龙邪！”

被后人捧为大圣人的孔子，竟对老子如此诚惶诚恐，可见老子的博大精深，是这位“圣人”所望尘莫及的。

相传老子出关时，骑的是青牛，关那边，则是西北的大沙漠……当然，也有传说，他是到一个疾病流行、被称为“扶风”的地方，他为了救人，每天都去看望，派人去请医生下治。可许多医生都怕自己染上疾病，不肯去，末了，他只好亲自去请了一位名医。

由于骑青牛，颠上颠下，摔得鼻青脸肿，加上没日没夜的奔波劳累，他自己也病倒了。当众人的病治好时，他自己反而不治了，就这么辞世——以他最后的一刻，再给人们昭示辉煌的人生哲理。

无论他是不是这么死的，他的著作，也都表明他是一位哀悯众生的伟大的人道主义大师！

老子的生卒年代，到现在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太难考证了，包括他是什么时候的人，都争执不下。既然孔子向老子请教过学问，那么，他应比孔子年长。孔子生在公元前551年，即周灵王二十一年，那么，老子大约生在周灵王初年，公元前570年左右。至于去世的时间，则更无法确定，一般以为是公元前470年，也就是说，他活了约莫100岁，甚至有的认为他活了一百四五十岁，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总是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一切，是绝对不会短寿的。

但他的著作《道德经》，却字字确凿，断无疑义，2000多年一直传了下来，被历代思想家奉为至宝，反复研讨，也争论不休。尤其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更发掘出了《老子》甲乙两种写本，这是目前所见到的最古的本子，且不分章目。它的编排顺序，则从今天流行的各种版本的下篇开始，即《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同当年韩非《解老》的顺序一样，为研究老子，提供了最可靠也最新的参考资料。

这位影响了中华文化2000多年，且又在2000多年后又重新在古墓中重新证明自身存在的大思想家，当还会影响中国、影响世界2000年、5000年、1万年，这是毫无疑问的。81章的《老子》，虽然一共才5000多字，但包含的内容，就是100万字也说不清，后人为注释《老子》，已不知有多少个版本，最早为韩非的《解老》《喻老》两篇，其中较有名的是西汉道家河上公的注，正是河上公把它分为81章，并称：

上经法天，天数奇，其章三十七；下经法地，地数偶，其章四十四。

三国时，魏国王弼亦有注，称《老子注》。

连唐玄宗亦去定了个上篇言道、下篇言德的顺序——所以，长沙马王堆古汉墓中，却是德篇在前而道经在后，原来是后来为自称老子后代的唐代李氏皇帝所改。

近代，则有著名思想家魏源的《老子本义》。

好一个老子，几千年闹个沸沸扬扬，众说纷纭，究竟其本来面目怎样，也就愈说愈不清楚了，这正应了孔夫子对这位先师的评价：能走的兽，可用罔捕捉；能游的鱼，可以用纶来钓取；能飞的鸟，则可以用矰射下。可是，老子却是一条龙，都不知什么样，能乘风直上宇天——那么，又怎么可以把握住他呢？

孔子这话说得太对了，老子是不可以把握的，他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注释《老子》的，讲究养生之道者，说它是修养的经典之作；军事家呢，又说它是兵书，讲的是战略战术；研究佛学的，更认为它是佛学“空”的同伴“无”的要旨；至于想成仙的，则以为它是学仙的妙诀。到了近

代,讲哲学的,把它引申为天演物竞的学说;讲政治的,视它为反对极权专制的理论武器;研究社会学的,更说它包含有损有余以补不足,抑奢侈去尚俭朴,拉平贫富,约束欲望,求得社会秩序之安宁等等,反正,无论你是从事哪一行的,均可以从中讨教到非常深刻的学问。及至现在,讲生态平衡,环境保护,人们又发现,老子早在 2000 多年前便预见到了……

这同样是一位思想家无可避免的命运!

命运的最后锻击

当了多年的史官,老子对史卷自有所感,自有所悟,可不,那已不是无声的竹简,而是活生生的历史,不用你揭动,它便会告诉你许多、许多……

虽说是粗茶淡饭,俸禄无几,可守藏室内的藏书,作为天下秘籍,却是千古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精神宝库,守住它,便守住了历史,也守住现在与未来,已有的经验、教训、警示、启迪,是无价可估的。

然而,周室内乱,王子与大臣为了争位,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一时间,杀个天昏地暗,王子朝抵挡不住彼方攻击,竟打开守藏室,席卷了周朝的重要典籍,逃亡楚国。

待老子闻讯赶到,只见门口散落若干简册,推开门,竟已是十室九空。

惨不忍睹!惨不忍睹!

这些典籍相伴他数十年之久,如同他自己的生命。如今,典籍不在了,何以安身立命?

可他立即便释然了:秘籍流失,固是一大损失,可典籍产生的思想,在我脑中却无法劫走……

旋即萌动了归乡之想。

正当这时,远在函谷关的好友尹喜,来信邀他去住几天,说是避乱也好,说是看看壮观的山色也好,或者,找个清静幽僻的地方读书写作,也更不错,当然,老朋友聚一聚,又何乐而不为。

于是,老子骑上青牛,西去函谷关了。

在那里,尹喜领他看尽了雄关险隘,也同他一诉衷情……末了,尹喜提出,这里清静,你何妨不多住几天,把你这几天同我谈的含义极深、机锋处处的话,还有你那些经多年苦思,探求出的“道”,用笔写下来,著成书简……我们相交多年,算得上知己了。

是呀,人生能得几知己呢?

于是,老子欣然命笔了。

多亏尹喜这番约请与劝说,才教老子留下这千古绝唱——

在这里,老子写下的正是五千言,却让后人说不透、解不尽的《道德经》。

思想家,大都是面临横逆而面不改色心不跳,乃至于以身殉道的;老子呢,面不改色心不跳,也许是出于一种超脱,一种透视,所以,他才寻了一处清静之地,让思想得到沉淀,让思想代替他自己,与千万年的横逆作斗争,他正是相信思想的力量,远胜过他个人的力量,更可力敌千古。

这也是一位大思想家对命运的一种选择: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历史与未来……

写完《道德经》,老子出了函谷关。

有人说他从此不知所终——毕竟,他已把一切留在了人世:千古至文,天地至文,藏之名山,传之后人,足矣。

却还有另一种说法。

说他到了秦国，那里正发生了瘟疫，先是在一位叫玉山的男子身上出现，又吐又拉，发高烧，肠绞痛，没多久便昏死过去了；很快，全家三口人都一样……一时间，这个地方便发生了恐慌。

瘟疫流行，病倒的人愈来愈多，死的人，也一天比一天多……

不少人合家外逃，却把病也扩散了。

老子不忍看生灵遭难，不仅去探望病人，还派人去请医生，有的医生却怕自己也染病，不肯前来，老子无奈，只好自己亲自出马了。

名医皆仰慕老子的威名，老子出面，焉有不从？

著名的医生桓也让他请到了。

然而，终日劳累，加上青牛背上颠簸得够可以的，年岁也不饶人，老子自己也病倒了，高烧昏迷……

竟撒手西归了。

他以他的死，证实了《道德经》中伟大的人道主义内核。

有人考证这是公元前471年7月21日清晨。

一颗巨星在东方陨落了。

但他的故事还没有完。

众人来吊唁，一个个哭得非常伤心，独有他生前一位至交秦佚来后，只哭了三声，便没事人一样了。

众人不高兴了，问：“你不是老子的好友至交么？”

秦佚点了点头。

“可你对好友之死，却表现得无情无义，不觉得太不像话了么？”

秦佚见众人这么认真，才作了解释：

“我以为你们了解老子，看来，并不是这样。我开始哭，是认为老先生和我都是世俗的人，现在想来，我们都该是超脱了世俗的人，老先生不是死了，而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所以，我才只哭了三声。我刚才进去看见，老年人哭老先生，就像哭自己的儿子一样，年轻人哭老先生，就像哭自己的母亲一样。这么一来，有些本只来看看场面的人，并不是来吊唁，却也因为过意不去挤出几滴眼泪，这便违背了真情。你们知道，老先生平生最受不了虚情假意的。”

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老先生出生，是顺乎自然；老先生去世，也是顺其自然。哀乐，对人本就是多余的事，大家哀伤时，老先生早已超脱了。”

是呀，生命总是在继续的，思想也永远如火炬一般光照人间，干吗要让没完没了的泪水来作祭奠呢？

无疑，秦佚作为老子的至交，道出了老子的生存态度。

也就是对命运的态度。

推而广之，他的这一态度，或可上升为哲理，不仅仅局限于人生，而是涉及到方方面面。例如，人生之“无为”，进而至治国的“无为”，从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在中国历史上可谓不乏成功的先例，中国古代最为鼎盛的两大朝代——汉朝与唐朝，为了让老百姓休养生息，都一度以黄老思想为治国的大政方针，而不搞儒家的“明知不可而为之”，把老百姓折腾个九死一生。